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0年11月17日 (第226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专家：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

下任美国总统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竞争者、对手还是敌人，将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

# 中美关系

## CNAS 分析美国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十四五”规划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期载文称，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将创新摆在“十四五”规划非常重要的位置，对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制定一套新的经济治国方略，以回应北京。

文章称，在国内，美国政府需要评估其经济治国方略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例如，美国的出口管制对美国高科技产业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决策者应与私营部门合作，了解供应链脱钩对国内高价值产业的影响。

在国际上，美国需要继续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协调，确保得到它们的支持。具体而言，美国可以带头在“五眼”联盟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共同机制，同时也促进在关键领域建立共同的研究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可以将“五眼”联盟以外的国家纳入这一多边机制。

文章称，目前美国在许多事关未来的领域，如半导体、航空航天和生物技术等，均领先于中国。倘若美国政府不完善其经济治国方略，以保持创新能力并且巩固在技术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导地位，这种绝对优势可能会消失。

## 美媒称美国需接受中国的崛起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阻止中国取得科技主导地位的做法将是徒劳且代价高昂的，美国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文章摘译如下：

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其不公平地获得

了经济和技术收益。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真正促成中国成功的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中国的储蓄率达 40%，是美欧的两倍，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投资资源，来为其技术领导力建立基础。中国投入巨资提升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中国的中学入学率已完全赶上西方，高等教育规模也有了爆炸式增长，工程师数量已是美国的两倍多，研发支出也超过了欧盟，甚至在未来十年内可能赶超美国。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会降低，中国的工程师会掌握更多技术，即使没有政府干预，中国对于未来的规划也可能变成现实。相比之下，美国的“脱钩”战略则有可能事与愿违。美国想通过切断贸易联系把美国从美中贸易关系中“解放”出来，但美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将中国供应商赶出美国市场相当于为高成本制造商提供了隐性补贴，并最终让美国消费者买单。

美国限制中国获取其关键技术的做法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作用，但不太可能明显减缓中国的发展。下一届美国政府应该接受中国的崛起，因为阻止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代价高昂。

## 美学者称美国应避免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出现

哈德逊研究所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执笔的报告称，美国应避免在东南亚、南亚、南太平洋和欧洲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

报告称，很多中国观察人士将“双循环”战略视为中国对特朗普政府“脱钩”政策的迟来回应，但中国早在特朗普执政之前便开始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提出的“经济脱钩”使中国开始在经济上与美国拉开距离。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帮助中国获得经济利益，建立外部市场，也帮助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基础

设施、平台和机构以推动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交流。“中国制造 2025”规划是这一倡议的补充，帮助中国在制造过程和产业链中获得主导地位。

为避免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出现，美国应当鼓励其他经济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使其关键的供应链多元化，将战略部门远离中国；二是在高价值和高科技部门商定共同的行业规则、标准和出口控制措施；三是将共同市场准入与遵守法律、监管和人权规则挂钩；四是寻求外部（非中国）资金来源，确保这些资金不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或对一个国主权或决策进行不合理限制；五是与美国合作，建立机构以更好地抵制“非法”和“掠夺性”的中国经济行为。

### 美学者认为美不应夸大或低估中国的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近日登载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阿里·温尼（Ali Wyne）的文章称，美国不应夸大或低估中国的威胁，并为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将对华政策纳入更广阔的视野中。美国不应低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多重竞争性挑战，也不应假设中国准备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合理看待中国提出的竞争性挑战，对于为美国提供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外交政策所需的心理慰安和战略带宽至关重要。人们越是相信中国不仅有追求全球霸权的意图，而且有实现这一意图的合理路径，就越会主张美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阻挠北京的进一步复兴。然而，如果采取防御性的政策，受制于中国的行动，就会把战略主动权让给北京。美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思考美国希望在疫情后建立怎样的秩序，以及如何与中国进行选择性的竞争来实现这一愿景。

第二，在海外重新定位，在国内重建。美国不能指望盟友和伙伴会自动相信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如果中国设法削弱美国的关系网，它不太可能凭借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做到这一点，但可能会通过其经济韧性以及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叙事，来说服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向东看。因此，美国应该在几面更加积极主动，包括：投资基础科学和技术研发；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域最有前途的学生；制定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在发展中世界建设技术密集型基础设施；协调多边方法来制定将管理前沿技术演化和使用的国际标准。

第三，寻求持续的共存。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已经系统地嵌入全球经济秩序，并不能随意割裂，因此，用冷战的视角来折射中美之间的战略紧张关系是错误的。虽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对于北京轨迹的担忧不断增加，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会加入全面的联盟来遏制中国。华盛顿和北京不仅要确保双方的军事摩擦不会升级为武装冲突，也要保留必要的合作空间。华盛顿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保持与北京合作的底线，华盛顿也无法确保其重要的国家利益。

### 美专家：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

下任美国总统如何明确定义中国至关重要，中国究竟是竞争者、对手还是敌人，将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

美国之音网站近期就未来中美关系发展采访了几位外交政策专家。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并非美国的敌人。

美国前驻华大使、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延续本届政府对中国

的定义，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他认为美中“所有关系将继续是一个竞争性混合体，既有敌对因素，也有有限的合作因素”，但中国不是美国的敌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的敌人”。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 (Jerome Cohen) 称，下任总统不应将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挑战过于简单化。他认为一个单词或一句话难以概括出对华战略，而是需要一项“4C”战略，即融合合作 (Cooperation)、竞争 (Competition)、批评 (Criticism)、遏制 (Containment)。虽然孔杰荣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竞争者和需要遏制的对象，但他更强调美中合作。“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与中国合作。在气候变化、环境和经济领域，以及那些我们经验不足的安全领域，如太空和网络、北极和南极，这些领域急需更好的规则、秩序和安全。”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范亚伦 (Aaron Friedberg) 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手。他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很重要的工作是指明中国对自由世界的共同挑战，“这种挑战全面存在于一系列领域中，包括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等”。范亚伦称，美国下任总统必须正视这些挑战，在对华政策上不光要防守，还要主动出击。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认同美国官方对中国的定义，即“等量级竞争者” (Peer Competitor)。他表示，将中国视为百分之百的敌手是错误的，“因为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想推翻全球体系或取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它确实想与美国竞争影响力”。“重点应转移到美国，即更好地加强自身，发展经济，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我们可以与中国竞争。”

洛德称，下任总统不应将重点放在关税上，美中经贸脱钩应该是有选择性的、集中在精准领域，而不是全面脱钩。他表示，

美国应该非常小心，对中国的一些依赖必须打破，“如关键的安全物品，未来流行病中需要的关键物品，药物、稀土等矿物”。

黎安友认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是失败的，“它并没有让中国经济发生任何根本性变化，也没有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他认为，美中经贸脱钩是复杂的问题，关乎安全的领域不可避免地将会脱钩。他建议下任总统在贸易上将安全考虑与经济考虑分开。“如果存在安全隐患，包括间谍、技术盗窃，那么政府应加以干预，以防止美国被利用。”

在台湾问题上，洛德大使肯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其中一个“好的方面”是，提升对台非官方关系，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他认为，美国应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黎安友认为，下任总统应重申基于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传统政策，“我不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改变对台政策”。范亚伦也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他不确定尝试改变是否有利。

此外，几乎所有受访者无论立场自由还是保守，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高科技巨头华为非常必要，且都认为美国应当在人权问题上进一步向中国施压。

## 美国外交

### 美媒：拜登外交团队将面临五大挑战

《华盛顿邮报》网站 11 月 10 日载文称，目前已自行宣布胜选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职后，其外交团队将面临五大挑战。

首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不仅被盟友孤立，而且将伊朗推

向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怀抱。拜登团队可以只是重新加入该协议，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国不仅努力回到协议中，还将弥补其缺陷并促使伊朗遵守该协议。

第二，制定一套具有现实性并反映现状的对华政策。对两党和盟国来说，根本性的冲突，即“威权政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已显而易见。拜登需要通过外交技巧与盟国形成统一战线，在知识产权盗窃和网络战等问题上获得筹码。

第三，确定中东政策的目标。目前仍不清楚一个更加稳定的中东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实现。拜登表示他不会立刻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且不打算大幅削减国防开支，但会重新考量威胁并分配资金以应对 21 世纪面临的阻碍。

第四，开展必要的公共外交。上任后拜登及其团队需要向美国民众解释美国的各项外交政策原则，比如，为何美国需要盟友，为何美国的繁荣依赖于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以及为何美国要在全球部署军队。

第五，特朗普及其同僚对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害，美国在全球失去了道德权威。采取具体行动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将对拜登有利。拜登可以宣布恢复人道的、负责任的难民政策。

总之，全球多国祝贺拜登胜选，这表明世界一直在等待美国回归。

###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给下任美总统亚洲政策提建议**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近期载文，为美国下届政府的外政策制定提出了 19 条建议，包括亚洲、欧洲、中东、国际和安全事务四个部分。本文节选了有关亚洲政策的建议。

第一，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美国加入将一举多得：一是加强美日关系，展示美国重新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决心；二是美日将共同领导各成员国，创建一个强大的由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集团；三是 CPTPP 涵盖了跨境数据流、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四是发展可信赖的供应商网络提供有效的平台；五是给美国国会提供机会决定什么新贸易协定是美国能够接受的。

第二，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资格将为美国提供一个与中国接触的平台，以完善基础设施标准、加强对亚投行资助项目甚至是“一带一路”倡议透明度的监督。美方与中方在亚投行或“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不仅能进一步扩大美方的商机，还能稳定中美关系，并向其他地区国家发出信号——在有益项目上无需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第三，在中国恢复和平队项目和富布赖特项目。特朗普政府减少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政策只会破坏美国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的声望，对民间关系打击最大的可能是相继取消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这些举措切断了在关键时刻访问和了解中国的渠道。

第四，深化与台湾的贸易关系。下届美政府应立即与台湾地区开展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或者，开始就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协定进行谈判，使之累积起具有与双边贸易协定同等的效用。

第五，与朝鲜达成临时协议。即使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接触最终失败，回到奥巴马时期“善意忽视”的对朝政策也是错误的。下届政府应寻求与朝鲜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要求朝鲜以可核实的方式拆除所有核生产能力，同时暂停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以换取部分（但不完全的）制裁的解除。

## 美国对外军售的风险正在上升

美国卡托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20 年军售风险指数》报告称，美国军售带来的风险上升。报告摘要如下：

自小布什政府以来，有两个明显的趋势表明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时风险逐渐升高。首先，美国现在每年出售的武器数量比以前更多。这一趋势始于奥巴马时期，在特朗普任内延续。其次，按美元价值计算，美国武器购买方的平均风险评分也在上升。

仅在 2019 年，美国就达成了价值 851 亿美元的武器交易，这是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年度交易总额最高的一年。在过去的 10 年里，美国出售了价值 1838 亿美元的武器。自 2002 年以来，美国最大的武器购买方平均购买了 140 亿美元的主要常规武器。

2002 至 2019 年，美国最大的五个武器购买方为：沙特阿拉伯（347.38 亿美元）、日本（230.43 亿美元）、以色列（184.33 亿美元）、埃及（179.35 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168.22 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韩国、澳大利亚、伊拉克、英国、阿联酋、加拿大、土耳其、科威特、希腊和德国。

从美元总价值的角度来看，军用飞机及其相关部件过去两年在美国武器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炸弹和导弹排在第二，地面车辆排在第三。不过，军售的总价值不一定是衡量风险或收益的最佳指标。军力的平衡很难衡量，不同的武器系统有不同的风险。

展望未来，美国应在军售过程中更充分地考虑风险因素，应该是停止向风险最高的国家出售武器，并确保国会批准每一笔军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迫使国会投票否决某一笔军售。

### 约瑟夫·奈：国际机制对美国仍然重要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近日刊登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的文章称，面对更加复杂的世界和美国优势相对减弱的情况，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并运用软实力吸引他国合作。为此，美国需要重新发现国际机制的重要性。文章摘要如下：

在 2016 年之前，美国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支持并寻求扩大国际机构。直到特朗普上任，美国政府才开始广泛批评多边机构。特朗普政府以狭隘的交易方式对待这些机构，并退出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机构不是魔法，但它们的确能创造有价值的行为模式。美国可以利用这些机构来使其他国家支持全球公共产品，这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特朗普对该如何行使权力有不同的理解，他抱怨“搭便车”行为，但方向盘仍掌握在美国手中。在这个各国相互依赖的时代，孤立、民族主义以及反全球化都是错误的选择，必须把国家认同与全球关注结合起来。

美国需要一个多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外国伙伴帮助美国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硬实力的影响，也受到其软实力的影响，后者建立在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政策上。正如基辛格所言，世界秩序取决于主导国能否将权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就此而言，国际机构不可或缺。

### **美专家：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论将延续**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11 月 7 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的文章称，尽管特朗普可能已经失去总统职位，特朗普主义仍然存在，这意味着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主张而进行的争斗将持续下去。文章摘要如下：

目前来看，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将制衡拜登的国内立法改革，

在当前阶段，拜登可以专攻总统具有更大自由度的外交政策领域，这也是拜登一直以来的志趣所在。

当前关于美国所扮演的全球角色的辩论仍在持续。根据人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将之划分为四大阵营（虽然这个划分有过于简化的风险）：第一，国家特别是联邦政府的适当角色是什么？第二，美国应该奉行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还是应采取更有选择性、更加克制的外交政策？将这两个问题进行二分法组合在一起，可以将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自由意志主义者位于第一象限。他们长期以来主张减少干预的外交政策，认为美国不应在西半球以外作出安全承诺，而应依靠强大的核威慑和广阔的大西洋、太平洋来确保自身安全。他们认为，即便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美国依旧可以保持安全、繁荣和自由的状态。他们主张避免与中国开展新冷战，因为代价高昂且不可避免地在国内自由产生威胁。

主流共和党人居于第二象限。他们对上文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根本上是矛盾的。他们希望建设一流的美军，使其具备全球作战的实力。但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需要强大的政府，也需要政府提供社会福利，以保持人民的健康和良好的教育，促进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社会团结，并确保美国的大学和研究实验室保持世界一流水平。小政府可能会吸引共和党富有的阶层，但这与其统治世界的愿望和随之而来的频繁发动战争的需求相矛盾。

桑德斯等进步主义者位于第三象限。他们重点关注国内政策，希望国家强大，资金充足，致力于解决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种族问题、警察制度、金融监管等问题。他们在美国是否应在世界范围内维护人权、制衡中国等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内部分歧。

守旧民主党人大多处于第四象限。他们仍致力于追求美国的全球领导力，青睐所有为人熟知的外交政策机构（如北约、联合

国)，并且希望美国带头加强或完善它们，并建立新的体系来解决 21 世纪的问题。然而，美国当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有强大的国家和强大的两党支持也不足以成功实现这一目标，尤其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受挑战的单极大国。

至于特朗普（或特朗普主义），难以归到在某一个象限。他有时像自由主义者，有时像进步主义者，从其实际执政政策来看，他更像是主流共和党人。总的来说，特朗普只是现代共和党身份更直白的表达。即使特朗普 2024 年不再参选，可能的竞选者也将延续特朗普主义。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媒称美年轻选民投票率大幅提高

Vox 新闻网近日载文称，在新冠疫情、种族主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推动下，美国年轻选民在今年大选中的投票率大幅上升，在胶着的大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文章摘要如下：

塔夫茨大学公民学习和参与信息与研究中心（CIRCLE）最近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年轻选民（18-29 岁）在今年大选中的投票率比 2016 年提高了 8%，由 45% 上升到 53%。年轻选民在所有选民中的占比也在上升，从四年前的 16% 上升到了今年的 17%。

鉴于年轻选民更偏向拜登，年轻选民投票率的提高可能对拜登在关键摇摆州获胜产生了影响。虽然少数州的年轻选民倾向于特朗普，但根据《纽约时报》的估计，在全美范围内，62% 的年轻选民把票投给了拜登，只有 35% 投票给特朗普。拜登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关注受到了大部分年轻选民的欢迎。此外，年轻有色

人种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年轻白人选民。

支持拜登的年轻选民最关心的是新冠疫情、种族主义和气候变化，而支持特朗普的年轻选民最关心经济问题。对于年轻黑人选民而言，种族主义和疫情一样重要。CIRCLE 的研究表明，疫情可能刺激了年轻选民。该机构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80% 的年轻选民称，疫情让他们意识到，政客的决定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多大影响。

年轻选民未来的投票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他们是一股不断增长的政治力量，未来政客们应该更加重视他们。

### 美媒分析特朗普在西语裔中支持率上升的原因

美国 TalkingPointsMemo (TPM) 政治新闻网载文称，在本次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西班牙语裔选民增多，鉴于他频频对非法移民“出言不逊”，这似乎令人感到意外。文章摘要如下：

鉴于少数族裔过去曾不成比例地支持民主党，一些民主党籍顾问和活动人士认为，随着“非白人”少数族裔在过去十年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民主党将享有持久的“政治多数”地位。然而，和亚裔一样，西语裔也是复杂的群体，内部有不同民族和文化。

在本次选举中，至少有几个因素促使一些西语裔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人。首先是民主党支持堕胎、同性婚姻，且一些极左翼民主党人在性别问题上立场极端。许多西语裔是天主教徒或福音派新教徒，有人反对堕胎、质疑同性婚姻，有人难以理解关于变性人权利的讨论和废除性别区分。

其次是经济和教育。西语裔工人阶级因为工作和福利给民主党投票，而随着他们经济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他们开始认同共和党人担忧的税收和支出问题。“拉丁裔决策”的选举民

调查显示，在本次选举中，特朗普在西语裔中的支持率似乎随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 美媒分析助力拜登获胜的四个人口趋势

Axios 网站近日载文称，城乡差异显示拜登在城市和城市附近地区具有优势，但特朗普在拉美裔选民中获得的支持值得民主党关注。文章称，四个人口趋势助力拜登在大选中获胜：

一是郊区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党的根本转变。在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在费城周边所有较大的郡获得的胜利都超过了 2016 年。在费城、底特律、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奥斯汀等城市附近的郊区以及更加偏蓝的州都发生了这种向左的转变。郊区正在不断发展并成为新的移民中心，种族和民族更加多样化。除非共和党人改变策略，否则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势可能对民主党人有利。

二是蓝色地区变得更蓝，但乡村地区对特朗普的支持稳固。拜登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包括在传统上对共和党友好的地区。但是，乡村地区对特朗普的支持依然强劲。

三是中西部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对拜登胜利的贡献不大，尽管这是他在民主党初选中的重要卖点之一。拜登试图赢得一些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一项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拜登的表现低于预期。

四是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在一些关键地区有所增长。大选结果凸显出美国拉美裔选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虽然民主党人对亚利桑那州拉美裔社区的关注，可能有助于拜登成功使该州翻蓝，但他们似乎在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丧失了拉美裔的支持。

## 大选后的美国政治将更加极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 (Thomas Carothers) 近日撰文称，大选后美国政治继续极化的迹象值得警惕，美国应管理而非试图治愈极化。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的大选体现了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程度之深。特朗普的批评者曾希望大选会对特朗普进行清算，并为缓解美国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打开大门。而特朗普在大选中相对较强的表现打消了他们的希望。

事实上，美国可能在三个重叠的阶段出现更严重的极化。第一，特朗普继续指责大选，助长了有关“大选欺诈”的阴谋论想法，而这将进一步点燃党派之间的怒火。特朗普似乎希望通过激化党派矛盾来引发某种危机，从而产生对他有利的局面。在他卸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会坚持这种做法。

第二，当拜登开始执政时，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几乎肯定会全力阻挠未来拜登政府的计划和倡议。这包括延缓批准拜登的提名、阻碍政府试图通过的重大立法，并给政府提名的联邦法官制造困难。立法障碍很可能会扩大到民主党人一直希望推进的有关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大部分或全部改革措施。即使是最温和的最高法院改革，譬如有关大法官任期限制的改革，也无法实现。即使拜登想以包容、不分裂的方式执政，两党的僵局仍会持续。在此前两届民主党总统领导的政府中，一直坚持焦土反对立场的共和党现在也不大可能改变。

第三，当共和党开始挑选 2024 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时，共和党可能认为 2020 年的失败不是因为其极端的思想路线，即反对一切民主党人支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候选人不够好。共和党在下次大选中可能只是换一个候选人，但竞选纲领不变。因此，就提供给美国民众的选择而言，2024 大选很可能像今年这



样极化，两个候选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点。简而言之，极化没有缓和的迹象，并且极化所带来的危险很可能还会加剧。

鉴于上述现实，一些试图应对极化的人或许应该放弃消除极化的想法，转而寻求更实际的做法，即管理极化。管理极化的要点在于，要保持护栏防止极化的体系偏离轨道。其他极化的民主国家的案例表明，保证极化体系不偏离轨道的两个最重要的护栏是：所有当权者尊重法治，选举治理体系获得足够的尊重来确保最具争议的选举不脱离轨道。

以极化作为主要施政策略的特朗普对这两个护栏造成了伤害，接下来美国要尽最大努力来维护并加强这两个护栏。在法治方面，应强化对当权者的道德和反腐规约，强化检察权独立、重塑监察长的角色、改革警察和监狱体制等。当务之急是改善美国分散和陈旧的选举管理体制，建立联邦选举机构。

美国政治机制中的极化问题难以治愈，人们至多能控制，或在中长期缓解极化。因此，现实地看待如何应对极化的问题以维持这方面的重要努力至关重要。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